

正视“三重二元”结构,力促转化“激活” ——对当前宏观经济的一点思考

Thoughts on Present Macroeconomy

石小敏

(中国体改研究会,高级经济师 北京 100017)

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步入“转型期”。“转型期”是事物由量变转入质变的时期。伴随着剧烈的变化,宏观经济出现了许多新现象与新特点。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些新现象与新特点,对于形势判断和政策选择都是十分重要的。

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的基本特征,作者认为,可以归纳为两个特点、一个格局。

两个特点是:

第一,市场机制在整个经济活动中日益取得主导的支配的地位。这是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变化。与仍然较多地束缚于传统计划与行政性管制积习的那部分经济力量相比,活跃于市场机制之中的经济力量,无论是成本效率、成长速度、所占比重、对增长与就业的贡献、活力与竞争力,还是对一般的要素配置、结构优化、制度创新的推动力及对社会文化形态和人心向背的影响力,均取得了日益鲜明的优势。1994年的宏观改革顺应了这一变化,1995年的企业改革继续促进着这一变化。与此形成强烈映照的是,旧体制的习惯势力仍在某些基础结构和重要的部门与体制环节上,在与经济建设密切关联的某些非经济领域中,顽强地保持着影响与支配地位,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转变增长方式和发展上台阶的较难逾越的“关隘”。

第二,与转型期相伴而来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国经济从80年代的以消费增长为主导的成长阶段跨入了90年代的以投资增长为主导的新成长阶段。这一新成长阶段的内在要求集中到一点,就是抓投资的机遇,上结构升级的台阶,争取用10~15年的时间,使我国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重加工制造业、高技术产业以及科技、教育、环保、农业、服务业、城镇与住房建设、文化事业等领域质差量缺的落后面貌有一个较大的改观,使这些部门与那些在80年代投资较多、升级较快、目前大多已处于过饱和竞争状态的轻加工制造业平衡协调起来,促

使东、西部发展差距上的倾斜状态顺其自然地得到矫正,从而大大调动我国的经济潜能与大大扩张我国的国内市场容量,极大地增强我国经济整体的国际竞争力。

国内的体制转型与成长阶段的切换,适逢与国际经济格局的大变动大调整同时发生,既给我国带来空前的机遇,也给我国带来巨大的风险。丧失机遇,必居人下。挑战是极其严峻的。纵观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的国内储蓄能力、引进外资的可能性、消费结构变化、投资品供给潜力以及老龄化到来时限等因素,我国在10~15年之内保持35~40%的投资率强度是完全可能的,若再辅之以得力措施不断提高投资质量与投资效率,以新的良性增长方式登上新的经济台阶是完全可能的。届时,我国经济整体的国际竞争力当位列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前茅。如果我们把这15年晃过去,仅从人口老龄化程度一个因素观察,历史也决不会再赐给中国一个同样的15年!应当看到,实现上述可能性的最大制约因素是体制,是金融体制、投资体制以及某些明显不合理的带有浓重行政性垄断色彩的管理机制。这些方面的体制改革倘不能有新突破,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抓住机遇;进了新阶段,也上不了新台阶。由于近来发生的某些迹象(如外国对中国的投资热情减退,美国穆迪公司对中国各大银行的评级急剧降格,国内大量游资不去投资实业和中长期项目而纷纷卷入短期投机炒作等等),人们对我国可能丧失机遇的担忧正在迅速增长!

一个格局是:“三重二元”格局。

急则混,缓则淤。1994年以来,我国经济日益明显地呈现出“三重二元”的格局,即城乡二元、外(向型)内(向型)二元,活(经济)“死”(经济)二元。这里讲的外向型、内向型,主要以其与国际经济接轨程度来区分;这里讲的活经济、“死”经济,则主要以其活力和竞争力的大小有无来区分。三重二元的格局,成为当前“转型期”我国宏观经济的特有景观。

三重二元经济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与经济活动的不同层面分布得参差错落,极不均衡。大致讲来,在沿海发达地区,活经济、外向型经济的比重较大,城市化水平较高,每一对二元经济之间的矛盾与差距较小,克服矛盾与差距的办法较多。内地则反之。总体呈沿海、内地差距拉大的景象。从经济活动的层面讲,以省级为界面,愈往下愈显活跃,特别是各地成长起一批千亿元市、百亿元县、十亿元镇、亿元村,各自拥有着一批“明星”企业与企业集团,虎虎有生气,十分兴旺;愈往上则愈显僵化,特别是宏观上银行、财政、国有经济部门困难加重,调控、决策余地缩小。从结构看,活经济、外向型经济结构偏“轻”(轻型产业),但近年来上规模、上水平速度较快,其结构也在逐步增“重”。“死”经济(和一部分弱经济)结构偏“重”,但体制僵化,士气靡散,债务飞长,日趋衰疲。从对宏观决策的影响力来讲,“死”、弱经济和垄断部门要强,外向型次之,最弱的是农业中传统种植业这一块。

当前宏观经济中出现的所有重大现象与重大问题,几乎无一不是因三重二元经济的内在矛盾与差距引起的,几乎无一不是通过改变三重二元经济中各重各元之间的相互联结方式与联结程度而得到激化或获得解决的。例如,“死”经济因生存危机而呈现不稳定,活经济因生机旺盛而要求快发展,为维持“死经济”稳定而抑制“活经济”发展,通过银行系统将大量资金“输血”给“死经济”,非但不能从根本上疗救“死经济”,反而进一步把银行拖入“坏帐泥潭”;同时,由于活经济的增长放慢,其容纳新增就业的能力降低,便出现全国范围内的民工潮问题,阻滞了农民依据市场需要创造出来的,以大规模跨区域迁移“打工”方式解决“以工补农”、调整农村就业结构与生产结构为特征的,从而缩小城乡差距与东西部差距的有效路径。其结果,暂时似乎“稳定”了“一头”,实质却引出更多的不稳,“死”与活经济之间、城乡之间、内外之间、东西部之间的矛盾加深了,全局中的治理通胀与增加就业、增长与效益、稳定与改革、稳定与发展、经济与政治的矛盾更突出了。旧体制与新体制由总量对峙和非规范的摩擦性竞争关系转为结构对峙和以垄断抗拒竞争的关系。由于结构问题、投资问题、市场问题不能较快地得到调理与疏导,使大量资金因无出路转变为游资与投机资本,充斥于证券与期货市场,靠投机保值、投机获利的行为风靡一时,勤劳致富、扎扎实

实求发展的社会心绪受到搅扰,这又是另一种的不稳定现象。国内资金不能充分利用,外汇储备猛增并大量低息存到国外,国内又在引进巨额外资去搞新技术、新设备含量很低的基础设施建设……宏观调控期间出现了诸多从宏观上看极不合理的现象。因此,三重二元经济之中,体制矛盾与发展差距纠缠在一起,历史缘由与现实因素纠缠在一起。以活、“死”二元经济而论,体制矛盾重于发展差距;就宏观整体而言,解决活“死”二元的体制矛盾,又成为统掣和转换全局的决定性一环。

值得单独一提的是,我国在城市经济中长期实行“边缘”突破、“增量”更新、双轨制、渐进式的改革方法,不可避免地滋养了一块“灰”经济。“灰”经济的本质特征是政企不分,即权力规则与市场规则混为一谈,其外在表现是权钱交易行为密集型。作为新、旧体制与活、“死”经济之间的联结带与缓冲物,“灰”经济客观上发挥了别物无法替代的历史功能。旧式权力规则的内在弊端与新生市场规则的不健全(后者的不健全常常是因为前者的难以克正),为灰经济提供了菌种和培养基,两者在改革上渐次拉开时小时大的差距则为灰经济提供了膨胀有时甚至是爆发式增长的空间,社会上原本就存在着的和一些外来的灰尘则为灰经济滋长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催化剂。灰经济的发展有一个由个案到常例,由小到大,由局部扩散到整体,由横向转为纵向,由收入分配进入到财产分配,由自下而上以钱换取政策和保护转为自上而下以权设租、以租谋私致富的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灰”经济原具有的软化旧章、变通政策、遮护创新的积极功能逐渐减弱;而其将万物罩于权、钱淫威之下,蔑视良善、崇尚投机、摧残信用、排挤公道的消极作用则逐渐增强。到如今,灰尘与灰色有弥塞宇内之势,令人窒息。固守旧思维、“死”经济的立场,是绝对无法诊治灰经济的。只有站在新体制和活经济的立场上,通过深化和加快改革,促旧变新,激“死”为活,才是从根本上抑制乃至翦除灰经济的正途,亦是从根本上抑制以至翦除腐败的正途。

以上简述的两个特点、一个格局,是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的三个基本特征,忽略这三个基本特征及其孕育着的历史走向,我们在分析处理具体问题时,就难以摆脱老经验与旧情感,就难免再一次陷入历史上曾多次欺侮过国人的片面性。

(责任编辑 蔡德诚)